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城建院交通院院长 秦国栋



刚才听了几位同志的介绍,有一些想法和个人观点。

第一,关于投融资体制。过去的投融资从政府主导,政府出钱加银行贷款,转变到现在引入社会资本。实际上认识到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讲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商业服务行为,成本也不可能通过向乘客出售车票来回收和平衡。所以就产生了投资到底如何处理,我们建立投融资的体制实际上就是基于我们认识到了双重的属性。

可能有的几点,一是尝试用外部的效益来补贴城市轨道交通,这是我们比较现实的选择。二是政府要承担公益性的投入,经济性的特点交给市场来解决。三是如何来平衡公益行为和市场行为的问题。这种尝试应该是非常好的,符合这一原则的投融资模式都应该是鼓励的,鼓励这种创新。但这就需要政策上给予支持,至少解决两点问题:1、确立我们用外部的效益来补贴城市轨道交通机制,也就是说把这种补贴制度化。2、既然引

入了社会资本,就要确立一个适度的市场竞争机制。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关于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问题。我

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轨道沿线的综合开发,也就是港铁比较成功的运作,“地铁+物业”的模式,不仅仅是投融资模式,更是一个城市发展

的理念,应该是轨道交通主导城市发展的理念。我们这次注意到,南京提出的地铁小镇的模式,深圳提出的建地铁就是建城市,包括上海提出的产城融合,实际上都是城市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理念。香港的成功经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互动的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香港地铁之所以成功得益于香港的土地出让制度,也得益于香港轨道交通主导城市发展的理念。

我注意到,香港的一个数据,香港全网有87个站点,港铁开发了43个站点,大陆去年年底通车的轨道交通大约有2200多个站点,我们几个站点是按照这种理念开发的?所以把这种创新,这种模式制度化是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融合的基石。要做到这种融合,在城乡规划的编制、管理体制、土地出让制度上进行创新。现在提出了土地分层规划、分层出让、土地作价注入轨道交通的经营主体等等,这些方面能不能从政策和法规上制度化,然后在全国推广。

“互联网+公益”暨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商业模式研讨会 在京召开

2017年1月15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主办的“互联网+公益”暨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商业模式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于商务部、发改委、人社部、工信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商业联合会、联盟经济文化委员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北京点公益基金会、中国投资协会、中冶黄金投资联合会、深圳前海中盛嘉鸿集团、新华社、中国网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出席了研讨会。

会议首先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冷柏军院长致辞。冷柏军教授表示在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传统商业模式,上演了一系列跨界传奇,大数据、商务智能和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企业的商业模式,新技术的发展及商业模式的变革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培养信息技术能力与国际商务知识互通互融的复合型人才为使命,开展相关社会服务,帮助企业的发展竞争中发展壮大。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为打造产学研政协同创新平台提供了契机,使得学术领域研究成果能够与商业模式及实践有机结合,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大力推进商业市场的规范化和良性发展。并以公益基金的方式,建设实体经济生态圈,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价值链创新,为企业转型、产业升级提供有利条件,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科技公司在促进实体经济有序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党委书记李兵教授认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在国家大力倡导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公益不仅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同时可以提高公益活动的效率;互联网作为平台为公益事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运用到公益领域必将开启公益事业新模式。

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副局长陈学东认为,作为国家机关部委局级退休干部,建议离退休干部在公益事业中按照“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志在奉献、服务社会”的原则,在充分尊重老同志意愿的基础上,吸收热衷志愿服务、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身体较好、愿意义务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老同志作为志愿者;按照老干部的兴趣、特长、意愿,并依托各系统的行业技术优势,分类组建老干部公益服务队,重点发展医疗保健、科教服务、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服务队。

北京一点公益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王立功表示,一点公益基金响应国家号召,采取“互联网+商业+公益”模式,抓住了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先机,利用互联网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传统线下实体销售系统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并与合作企业以建立行业联盟的健康文化环境,增加企业凝聚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规划今后三年将在军民融合发展、精准扶贫、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社会性公益活动,重点探索在文化、教育、科技、健康等领域建设创新的公益事业平台。

中国网《公益中国》、《中国品牌》、《文明中华》频道总编辑吴仕鹏作了“互联网+”背景下公益新思维新模式的主旨发言。他认为,公益的源泉是实体经济,希望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推动公益的快速发展。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中欧工业4.0研究院院长乔赢作了“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公益”的主旨发言。他结合自身实践提到互联网经济的逻辑起点,采取哲学、数学和艺术的综合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提到了互联网经济的特征:建议商业企业将信息作为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工业4.0标准及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是企业急需了解和研究的内容,为下一步的有效转型升级提供强力保障。

分组研讨阶段,信息学院华迎教授、李兵教授分别就“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创新、舆情分析在“互联网+公益”中的应用做主题演讲,并同参会人员互动。同时,深圳前海中盛嘉鸿集团代表王友红从企业实践角度介绍了一点科技商家联盟发展基础与运营模式。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响应了国家十三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依托“互联网+”新业态,探索互联网模式下实体经济的发展,结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信息学院今后将积极打造产学研政协同创新平台。

据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成立于2001年3月,经过多年的建设,建立了具有国际化、现代化特色的本、硕、博及博士后等多层次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快速发展,师资队伍得到较大的加强,形成了较强的教学与科研能力,教学水平步入了国内先进行列,同时也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学院现有教职工近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0余人;此外,学院还从各部委、其他高校、科研单位聘请金融信息化管理、电子商务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学院兼职教授。

学院拥有条件优越的国家级实验中心、电子商务研究所、金融科技中心和中外经贸合作网信息采编中心;长期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社科及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主持并参加了科技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的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出版各类著作及教学参考书百余部,发表数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周锦

地铁业主身份的演变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 陈建国

在配合基础产业司组织这次研讨会的过程中,协会也组织国内的部分地铁业主,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专题研究。

今天听下来感觉到会的业主身份在转变,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地铁业主+国企+政府”单一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在向社会资本转变,所以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投融资机制创新也不是停留在这样的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更大的社会资本

出现,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出现,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归纳起来讲,几个业主的核心提法就是希望在建设城轨项目的同时,能够同步进行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利用,这是一个核心的思想。应该说,目前来看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交通场站周边土地综合开发这个规划和地铁建设规划同步。做好同步的好处我

不说了,但是能不能做好,如何靠制度来保证两个规划同步实施,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两个规划的开发主体一致性问题。如果两个规划的开发主体一致,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反哺,也能够最高效率的土地利用,所以这是值得非常关注的事情。

三是现行土地取得方式。其实土地取得方式不是简单的协议出让或者招拍挂,虽然里面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上海没有说出来,

实际上有协议出让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不敢实施,缺乏的是法律法规的保障。

这一点我中午和香港地铁方面谈论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度上的保障,如果内地也建立了这种制度上的保障,我相信土地获得的模式能够确保或者促进两个业主的一致化,两个规划开发业主的开发主体的一致化,如果能够到达这一点,社会资本的进入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国货币扩张遇到瓶颈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胡月晓

2016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公开市场操作的频度和力度,其他流动性投放工具的使用也相应增加,MLF余额由年初的5145亿增加到年末34573亿,PSL由10800亿增加到20500亿;2017年初,中国央行还新设了“临时流动性便利”的新货币投放工具。然而,2016年年11月以来资金紧张态势并没有多少缓解,“流动性拐点”成为市场主流预期。笔者认为,在中国新货币形成机制下,市场认为中国货币的未来扩张基础已遇到“瓶颈”——即使央行愿意加大投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将面临“无券可押”窘境。中国货币的信用基础不足问题(首次浮现于公众和市场面前。

一、中国新货币机制形成

2014年后,推动中国货币被动高增长的外汇占款已转向收缩,中国货币投放新机制逐渐形成(详见笔者之前发于本网的《中国货币政策:明年不松》)。中国新货币机制的基础,是货币投放基础由外汇占款转向公开市场操作(OM)和贷款、贴现窗口的投放,货币投放的主动性增强。

由引起储备货币增长的项目变动变化分析可知,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基础已由外汇占款,转向了OM和窗口操作,货币调控转向准备金领域,表明中国货币形成机制发生改变,金融市场化基础形成。决定中国储备货币增长的项目变化,使得中国货币形成机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具有被动特征的外汇占款增长退居次位,央行可以主动控制的公开市场操作走上前台,成为左右中国货币投放的主要载体。

新货币形成机制的一个最重要变化,就是货币投放的信用基础由外汇转向国债,由于作为信用基础的国债深度和广度的不足,除非真能发挥准备金的“池子”功能,中国未来的货币增长将延续较长时期的低增长态势。中国货币投放基础带来了货币信用基础的改变,中国货币开始真正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的政策开始与美元脱钩,这不仅给人民币的国内信誉(与汇率挂钩管理)带来了新问题,也给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了新课题(汇率锚选择和资本开放)。综合各国信用货币体系运作实践,国债体系的发展完善,作为中国当前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前期和基础,需引起各界的充分重视。市场有谚云“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财政问题”,其背后逻辑就在于此。

受到预期引导、投放基础、经济调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7年中国的货币增长仍将如政策所言,维持偏紧态势。中国货币格局面临着“过度深化”和资金紧张并存的矛盾局面。造成前者的原因,市场认为是外汇占款增长带来了基础货币被动投放,进而造成了中国的高存款准备金比率(RRR)状态;对于后者,不同时间有不同解释,市场并没有一致看法,典

型如2013年年中和2016年年末时期的货币市场震动,不过笔者认为,不论何种解释,资金紧张归根究底是货币增量不足。存量过多和增量不足构成了中国货币的复杂形势的表现特征,资金脱实向虚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资产流动性不足,固化了过多的货币,使得中国经济对增量货币有着超强劲的需求。

二、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信用特征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各国货币当局普遍将基础货币的创设与国家信用直接挂钩,即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时,商业银行必须向央行提供国债等代表国家信用的抵押物。在货币利率的调节上,央行通过直接和市场交易符合一定标准的国库券,直接影响了银行间市场,尤其是准备金市场上的利率,如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各国实践看,央行通过抵押品管理和交易标的的选择,使储备货币的发行和国家信用建立起直接联系。

从基础货币创设实践看,虽然各国央行的抵押品管理大都突破了国债的限制,通常把高等级的金融债、ABS、信用债和信贷资产都纳入可抵押范围,尤其在危机时期,货币当局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为达到扩张流动性、救助银行的目的,抵押品标准通常会临时下降。储备货币创设过程中,没有和国家信用挂钩,意味着货币的国家信用是隐性的,即国家会对以储备货币进行信用创造的金融机构负责;如果储备货币的创设是严格和国家信用挂钩,那么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就是显性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行为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各国规定较宽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将抵押信用由国家信用扩展至企业信用,目的是为了对危机时期合格抵押品不足的现象提前应对,对非常时期的抵押物扩张提前做出法律许可,而平时时期的合格抵押品选择仍然集中在国家信用品种上。

三、体现货币国家信用的基础只能是国债

在储备货币创设的四项目中,显然只有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贴现窗口的操作能与国家信用直接挂钩。除了实行货币局或联系汇率制度的小规模经济体,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的国家,无不以OM和贷款、贴现窗口,为储备货币形成主要来源。

显然,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贴现窗

口操作的规模,需要有充足的抵押物,实践中能够充当的都是体现国家信用的各类国家债务工具,如国债、政府支持债券等。尽管存在着社会信用抵押物的法律许可,但通常只有在危机时期,储备货币的扩张才会稍偏向倚重社会信用抵押物。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国家债务通过充当储备货币创设过程中的抵押物,使主权货币具备了显性国家信用,这就是国家信用的货币经济学意义。国债的货币经济学意义,使得国债不再是单纯“债务”,而且还是主权货币发行的基础和保证。在世纪之交的1998-2001年,美国经济正引领“新经济”的潮流,风头正劲。经济繁荣带来财政状况的改善,美国国债规模持续下降,国债余额占债券市场和GDP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经济繁荣也带来了同期美国整体流动性的提高,相应美联储(FED)储备货币创设需求增长,但国债的减少直接影响了FED的基础货币投放,时任FED主席格林斯潘就多次呼吁保持国债规模适度增长。

基于国债的货币经济学意义,保持适度国债规模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信用货币体系需要国债维持一定规模,部分国债因此获得永远不需要偿还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作为信用货币体系运作成熟和国际货币地位国,确实不需要考虑还清国债——适度规模管理即可!

中国国债规模的创设来源正处在转变过程中,能体现国家信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贴现窗口操作的比重上升,加之储备货币本身正常的增长需要,信用货币体系完善对国债存量规模和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中国要依靠OM和贷款、贴现窗口的操作,实现储备货币的增长,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国家债务工具的规模,以保持人民币增后的国家信用本质。但直到如今,中国国家债务管理对信用货币体系完善的影响,仍未提上日程,甚至没有注意到货币发行和国家债务增长之间的关系。单纯从货币增长角度,忽视主权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本质,扩大央行抵押品范围至商业信用的呼声,竟然还有不少市场!

四、政府债务管理框架应有创新突破

实现信用货币体系下流动性平稳的需要,以及基于国债的货币经济学意义,政府债务管理突破债务管理局限,在全新的“债务-货币”经济学思维下,看待政府债务发展。

首先,创新思维加快国债规模增长。过去

中国货币的信用基础不足问题,浮现于市场面前;信用货币体系完善对国债存量规模和结构提出新要求。